



论北宋朝廷对佛教发展的支持

A Study of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胡婧怡

OH JING YI

19ALB0665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3

目次

宣誓·····	1
摘要·····	2-3
致谢·····	4
第一章 绪论·····	5-6
第一节 前人文献研究·····	6-8
第二节 研究目的·····	8-9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9-10
第二章 北宋朝廷与佛教的关系·····	10-11
第一节 北宋多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	11-15
第二节 北宋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与排佛性·····	15-20
第三章 北宋朝廷支持的政策下佛教僧人与寺庙·····	20
第一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僧人的境遇·····	20-23
第二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寺庙的建立与经济·····	23-25

第四章 北宋朝廷支持的佛教各宗派的发展及译经·····	25
第一节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宗派的发展·····	25-30
第二节 北宋时期朝廷支持的佛教译经·····	30-33
第五章 结论·····	33-34
引用书目·····	35-3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
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胡婧怡 OH JING YI

学号：19ALB06654

日期：2023年11月16日

论文题目：北宋朝廷对佛教发展的支持

学生姓名：胡婧怡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论文关注北宋时期朝廷对佛教支持促使佛教的流传与发展境况。论文第一章作为文章开篇，绪论陈述包括前人文献研究，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及方法。第二章探讨北宋王权与佛教的关系，以多位皇帝和文人士大夫的态度来看佛教的传播与排佛。第三章则以北宋朝廷政策下的佛教即僧人和寺庙来探讨佛教的流传。第四章以朝廷支持下的北宋佛教各宗派发展和宋太宗时期译经的过程来观察佛教的发展史。第五章结语。北宋时期，佛教盛行，信众甚多，其中包括赵宋皇帝直至平民百姓。禅宗里的云门宗被广泛推崇，很多僧人来到北宋进行传法。北宋寺庙的数量也远超前代，深深影响了宋人。本文选择以朝廷为切入点来探讨众多皇帝对佛教的支持与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僧人来到中国传教与寺庙的林立，佛教各宗的发展以更加了解当时佛教的传播的状况，加上佛教宗派与译经的过程的探讨更能了解到当时佛教的流传情形，同时也探讨当时佛教流传的重要性。

【关键词】 北宋、朝廷、佛教、发展、支持

致谢

毕业论文对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有着不同的意义，与之前论文的撰写是完全不同的。毕业论文的撰写实在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为各个撰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动力，为此须认真对待。在这匆忙的学期里，能完成毕业论文少不了方美富老师的建议与帮助。在此，我想向方老师致谢，论文的定题与大致范围也是方老师给的建议才让我产生了论文的架构与内容的要点，当然也少不了方老师推荐的相关书籍也给了我论文该如何书写的方向。我虽然也做过有关佛教的论文，但一开始对北宋时期佛教的具体详情是不甚了解的，只是当时笔者会选择此题目的原因是我对北宋时期佛教的传播与流传非常感兴趣。在完成论文期间，我也大量地查阅资料，尽自己所能把论文写到最好。

其次，我想感谢母亲的关怀与开导。在做论文期间，身心相当劳累，还好有家人的问候及关怀，加上我这学期除了写毕业论文外，还需做社会学的论文和准备应付考试、这学期较短，时间非常紧凑，这让我非常繁忙。母亲为此也会劝我劳逸结合，多休息，以免太劳累而生病，但最终还是难逃病毒的魔爪，得了新冠，这让我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完成我的论文，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

最后，我想感谢跟我一样忙着写毕业论文的朋友及同学们。有些问题我不清楚但想快速得到解答时，我的朋友和同学就会给出一些建议，并互相交流写论文的要素等，实在是帮上了我的忙。此外，我在实习期间遇到的中文系的学长和学姐也有跟我交流论文上的事情，并提醒及鼓励我及时完成我的论文，让我能重拾信心，并让我有动力完善我的论文。

第一章 绪论

宗教自古以来都扮演着人民心灵寄托的角色。儒家与道教精神特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而延续至中国的历届朝代，佛教的传入也是情势所趋。当时汉代丝绸之路的推行使胡人来到中国经商，佛教也由此传入中国。在宋代以前，佛经已不断地涌入，其中唐玄奘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也广为流传，更多佛教梵语的典籍翻译成中文的佛教典籍。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儒、释、道三教鼎立，三教信众甚多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废除后周，建立宋朝，开启了北宋时期，而在北宋前经历了五代十国、五胡乱华等的动乱，并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即辽国的虎视眈眈，经济遭到破坏等，这使当时的佛教轮落到凋零的地步。直至北宋的成立才出现了复苏的情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思想方面如佛教的流传¹。北宋佛教能如此兴盛，其中的因素包括了北宋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平民对佛教的拥护，尤其是禅宗更是被广大地推广,使北宋大多数权贵、文人及百姓所接受。相对的，当然也存在一些皇帝、士大夫等排佛,不支持佛教，他们认为佛教来自夷狄外邦，且佛教的理论与思想上与儒学和道家有所出入，而佛教在印度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传入中国的佛教更是慢慢本土化，与印度佛教的教义存在着不同之处，参合了道教和儒家的学说，不断地改善佛教及辩驳其他学说对佛教的误解及批评。

¹.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 386。

北宋禅宗是最备受欢迎的佛教宗派，而接着是天台宗和净土宗²。其中各宗派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如各宗开始融合深入进行，禅宗变成了融合型的主体,证实了佛教的快速发展如朝廷支持佛教的译经³。宋太祖时期，《大藏经》的刊印、外僧来中国等使佛教的受众程度提高。而到了宋太宗时期，译经院的设置使译经的任务得以展开，加上众多僧人的到来使译经的过程更加顺利，译出来的经书与原文也较贴切，创造了北宋历史上译经的篇章。

本研究将以北宋时期朝廷对佛教的支持，包括北宋诸多皇帝、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和排佛争议，北宋僧人和寺庙、北宋佛教各宗派和译经的过程来探讨北宋佛教的传播和流传。本研究以此题目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意识到佛教在北宋时期的传播是存在些许困难的。当时佛教的流传情况也鲜少被人所知，但僧人却能克服困难地传教，北宋人们也能接受外来的佛教，与道教和儒家所宣传的不同思想的氛围下进行磨合，而创造了全新的,属于中国的佛教，实属难得。接着，国内外学术界对北宋佛教的传播的研究尚少。通过本文能知道北宋佛教流传与传播的境况，给予较为全面的研究，进而促进学者们对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的状况的理解。

第一节 前人文献研究

在撰写北宋佛教的流传的论文时，我借助了很多学者所作的北宋时期佛教的历史的书籍作为我的论文参考资料之一。其中，杨曾文的《宋元禅宗史》记载了

².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2。

³.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2。

北宋时期的禅宗包括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等与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尊崇，让本研究得以借鉴及参考，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其中对于北宋皇帝的支持的部分较少。

此外，赵伟《北宋文人与佛教》也是记载了北宋历代皇帝对佛教所做的贡献，其中含有不少对本文启发很大的参考资料，但所写的资料太杂、引用太多不同的文献，资料也不是很全面及较主观。宋朝正受所撰的《嘉泰普灯录》则以长篇的文章来叙述众多禅师，在研究禅师方面的资料是全面的，但实则对本研究所写的内容帮助不大，本研究也只引用了序文里对北宋皇帝对待佛教的举动进行描述。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记载了译经的过程，解释得相当详细、对北宋皇帝支持佛教的举动也有所记载。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对北宋时期佛教传播的描述篇幅较短，其中也有记载北宋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第二、三、四册和第五册提供了大量关于北宋时期的佛教的资料，对本研究来说是最好的参考资料，书中提及了北宋寺庙、僧人、文人等较为全面的信息。这几册书都是提供了很多关于宋代寺庙、北宋僧人、北宋历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文人士大夫的尊佛与排佛的资料，清晰地描述了北宋佛教史。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提及中国佛教的概念、中国佛教中古早期的传播和适应的情形，士大夫佛教、汉代佛教的传入直至东晋末年的佛教，其中并未提及唐、北宋之后的佛教。

陈振《宋史》里对北宋历史的阐述是较多的, 其中也有提及儒、佛、道三教的相互融合、佛教各宗派如禅宗、临济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等的发展、北宋僧尼剃度、考试、度牒等内容, 但篇幅较短。

张培峰的《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里对宋代文人士大夫佛学的政治、社会及思想背景和针对各别的士大夫被佛教的影响的个案进行研究, 其中还包括士大夫佛学诗文及著述的篇章做出的分析与所提供的士大夫佛学的资料相对来说是很完善的。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对宋代社会与禅宗及其发展阶段的描述分析也是写得很详细, 其中有些内容都是在其他参考资料没有找到的。此外, 望月信亨作, 释印海译的《中国净土教理史》中有很多关于宋代的净土宗的资料, 也有提及宋仁宗及僧人的描述, 可谓是净土宗相当详细的资料。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对宋代禅宗概貌、思想、禅史、士大夫禅学等的叙述也是详细周到。姚瀛艇的《宋代文化史》里有提及宋代佛教的流行和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 是一部较为合适的参考资料。蒋羲斌的《宋儒与佛教》里对宋代的文人与佛教的对话, 其内容跟我所写的相关内容比较少。牟钟鉴和张践著的《中国宗教通史》里对宋朝佛教及宗派所提供的资料很充足, 如北宋佛教各宗派的事迹及僧人的阐述很多, 译经和刻藏的过程及记载的事迹也非常详细, 提供了一些对我有所帮助的资料。闫孟祥的《宋代佛教史》对北宋佛教宗派、历史背景、佛教的管理及其在北宋的基础地位也都有描述, 与我的章节的分配相似。

第二节 研究目的

选择北宋时期佛教的流传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选题的主要因素是我想探讨佛教在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以此了解佛教在传播及流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此外，北宋佛教的传播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中佛教史与现今佛教的发展有所借鉴与好处。通过北宋朝廷的支持为切入点、以北宋多位皇帝及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支持及排佛争议的情形、北宋寺庙的建立及经济和僧人来华传教的描述、佛教各宗派的发展、译经的过程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其中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北宋的撰写者所写的有关北宋佛教书籍资料较少，大多数是各宗派及历史的概述，资料的形式也太杂，要找出对应的资料确实有些困难。因此，本文所引用的资料来自南宋至现代的研究材料，史书也对佛教的记载甚少，况且北宋年代久远而致使参考资料面对的真实性的问题也是我在筛选资料时需考虑的问题。

第三节 研究范围及方法

本研究范围定于北宋时期佛教的流传。通过一番研究，我发现佛教在北宋的事迹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其中北宋多位皇帝都以包容和尊佛的态度支持佛教的发展。同时，由于定于北宋时期而不是两宋时期，研究范围就不会太广，正好适合我做研究。我以多位北宋皇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和徽宗为例，加上我参考的资料让我确定我所列出的这些北宋皇帝是适合来探讨北宋佛教的流传。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如资料里最常提及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来探讨他们的学佛态度与一些文人如孙复、石介的排佛也置入内容里。我还以朝廷对寺庙和僧人的支持的角度来看北宋佛教的传播，其中寺庙的普及化和僧人的传法也是大大地提高佛教传播的效率。然后是以佛教各宗派发展作为探讨对象，来看朝廷对各宗派的态度。最后则详细提及北宋太宗时期的译经的过程及之后译经的废绝。

在研究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北宋时期与佛教的相关资料，加上毕业论文导师的建议，才得以顺利完成此论文。

本论文主要采取宗教史作为研究方法，即以史学来研究宗教。宗教史中对佛教的发展有着详细的记载，与我所撰写的论文息息相关。以北宋时期朝廷对佛教发展的支持为定题，我把研究方法即宗教史的范围定在中国北宋时期的佛教。在撰写这篇论文期间，我翻阅，参考及引用宗教史的书籍中的资料，从中了解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演变的流程，如我到拉曼大学图书馆寻找宋朝至现代相关佛教史的书籍及阅览该资料如《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文化史》、《佛祖统纪》、《嘉泰普灯录》、《中国宗教通史》等书籍作为参考，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了佛教各宗派的历史与发展、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尊佛与排佛的态度等，让我对北宋时期的佛教有了清晰的认识，使我在撰写论文期间能够获得充足的宗教史资料，顺利地完成此论文。

第二章 北宋朝廷与佛教的关系

北宋年间，朝廷对佛教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了佛教经书的印刷，如太祖时期，印刷技术盛行，佛教的典籍从手抄至印刷出版，可见北宋时期的印刷技术已经超越唐代，《大藏经》的印刷更是为中国历史的添上一笔色彩。佛教到了宋太宗时期佛教的译经达到最盛。朝廷里的士大夫对佛教具有不同的态度，有些士大夫包容佛教、对佛教如对待道教与儒家般尊崇，而有些士大夫研究了佛教

典籍后，对佛教思想产生一些误解或本身存在偏见，而进行排佛的举动，但也有
一开始排佛的士大夫最后信奉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而能在中国发展极好，
尤其是北宋时期，佛教的复兴使众多中国人成为佛教信徒，也摒弃周世宗打压佛
教的观念，可见朝廷的支持起到关键的作用。

第一节 北宋多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

本章将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对待佛教的态度为例展
开叙述。宋太祖赵匡胤是北宋开国皇帝。经历了前朝战乱后的佛教开始复兴，而
宋太祖在振兴佛教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宋太祖废弃、终止后周世宗
排斥、打压、毁佛的指令⁴。相对的，宋太祖对佛教显示了尊崇的姿态，其中赵匡
胤的母亲与夫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⁵，在这种信佛的家庭因素影响下，赵匡胤也受
其影响，如太祖于建隆元年六月诏各个寺院，不毁坏后周世宗时期废弃的寺院，
而不幸毁坏的寺院里还有遗留下的佛像则下令保存起来⁶，可见太祖不想重蹈后周
世宗的覆辙，并引以为鉴，有意扶持佛教。宋太祖遣使内官张从信至蜀地益州负
责雕刻造出大藏经，而该大藏经是以“开元录”为依据，预备出版一千零七十六
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大藏经，以四川省特别生产的十三万片版木来雕刻经文⁷。这
个雕刻过程耗了十二年方才完成，之后把这些雕刻的经文即称为《开宝藏》，送
去汴梁，并复印于太平兴国寺的印院，复印完成之时就分发给大宋的寺院⁸。从宋
太祖自发地想印刷佛教的大藏经的行为来看，宋太祖是非常笃信佛教的，以至于

⁴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页 253。

⁵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页 9。

⁶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3。

⁷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台北：天华出版，2005），页 400。

⁸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0。

能不惜耗费人力、物力、钱财和时间来打造印刷版的大藏经。由于印刷的大藏经在北宋时期是首次大量地出版，因此，这北宋的大藏经显得弥足珍贵，寺庙里通常把印刷版的大藏经当成法宝来对待，并把大藏经收藏于藏经楼中⁹，常人也没机会阅读。由于唐朝以前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还有五代十国的动乱，佛教于那时起渐渐衰颓，而北宋的立国使佛教得到了缓和及复兴的机会，加上宋太祖的鼎力支持，大藏经才不负众望出版了。北宋最早的官版大藏经是于太平兴国八年发行。这北宋官版大藏经成为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参照物¹⁰，可见北宋官版大藏经的珍贵与重要，也是开辟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

到了宋太宗时期，宋太宗继承了宋太祖的对佛教的伟业，下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还设置了完善的组织机构的译经院¹¹，延续二百多年停滞的官刻译经。译经院也建立在太平兴国寺，并开设三堂¹²。译经院于六月建成，宋太宗下诏让天息灾等人住下，参与译经的活动。宋太宗下诏僧尼们“作诗送”，当中仅有陈彭年的诗留下来。宋太宗还能辨识僧人所写的书法，如点评钱昱的翰牍“体格服软，其失乃俗，独此儿不类”¹³，足可见宋太宗非常熟悉及认识这些僧人的字体，从而也显示了宋太宗与僧人的来往及对佛教的尊崇。宋太宗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并把此序刻在碑上，以期能流传下来¹⁴，可见宋太宗对译经的支持，把序刻在碑上也使其能流传得更久远，也透露着宋太宗对此序的看重。朝廷中不免有些大臣是排佛的，当宋太宗让苏易简撰碑文并赏赐给西域僧法，朝中一些大臣认为苏易简所撰的含有“鄙佛为夷人之语”，对佛教不敬而太宗为此也相当不愉快而

⁹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0。

¹⁰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页 116。

¹¹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¹²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398。

¹³ [宋] 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58。

¹⁴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页 456。

换成朱昂来撰写¹⁵，从中可见宋太宗对撰碑文的严谨看待，不想以此辱佛，以表达宋太宗对佛教的敬意。

宋真宗赵恒对佛教也是相当崇信的，即开设七十二所戒坛¹⁶，展开登坛受戒的制度，规定满十八岁的僧和满十五岁的尼才可剃度受戒¹⁷，可见受戒制度的条规下的僧尼年龄有所限制而《佛祖统纪》里记载宋真宗“是岁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人¹⁸”的情形显示了僧人数量之多，意味着当时佛教的兴盛。宋真宗对佛教有了透彻的认识，如真宗曾经撰写和佛教有关联的文章如《法音集》、《崇释论》、《注四十二章遗教》等¹⁹，可见真宗熟读佛教典籍与对佛教理论的理解非常深厚，以至于能创作出这些与佛教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也达到了极高的标准。宋真宗在《崇释论》提及佛教与儒家都是有着相同的“道”，只是“迹异”²⁰、儒家是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其志，是在远古时候的中国产生的，而佛教却是来自印度，而非中国产生的，这也是宋真宗想要表达的儒家与佛教的“足迹”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怀有共同的目标与宗旨，那就是引人向善，对人类有益、对社会及国家有益的宗教。宋真宗还曾下令“淮、浙、荆湖治放生池，禁渔采”²¹，可见宋真宗对佛教的禁止杀生的戒规及食素的看重，以致于下达开启放生池和禁止捕鱼诏令。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对禅宗极其提拔。天息灾当时仍在朝廷，他提议让宋仁宗选择大约五十人的两条街的童子来学习梵字，以致后代能持续译经。

¹⁵. [宋]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97。

¹⁶. [宋] 志磐，《佛祖统计》卷四十四，页 402。

¹⁷. 陈振，《宋史》，页 733。

¹⁸. [宋] 志磐，《佛祖统计》卷四十四，页 402。

¹⁹.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页 402。

²⁰.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页 402。

²¹.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真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 163。

梵僧的遥相间隔也是导致译经的工程废绝的因素²²，而天息灾的提议正好避免这种状况发生。此外，宋仁宗也与众多禅师探讨禅宗的理论，现留下记载的是与德章和怀璉的交谈。其中宋仁宗和德章禅师认识较早，交往甚密²³。宋仁宗对禅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怀璉较晚与宋仁宗交谈禅。宋仁宗意欲建成十方净因禅寺，而召见怀璉出任方丈，促使禅宗在京城和北方的快速传播²⁴。从宋仁宗对禅师尊崇的态度来看，宋仁宗能与禅师交流禅的观念，可见其对禅的理解颇深，是绝对的佛教徒。《佛祖统纪》还记载宋仁宗“迎六祖衣钵，入京阙供养，及至奉安大内清净堂。敕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钵记》”²⁵的事迹，仁宗迎接记供养禅宗六祖慧能的衣钵，还令晏殊记载此事，这显示了仁宗对禅宗的尊崇与欣赏，有意提拔禅宗，让禅宗得以迅速流传。

宋神宗曾经发下诏令把相国寺六十寺院改为八院即两所禅院和六所律院。两所禅院分别是慧林禅院和智海禅院。宋神宗下诏令云门宗僧宗本为慧林禅院的住持，云门宗本逸为智海禅院的住持并下诏让云门宗僧法秀入入住法云禅寺传法²⁶。由此可见，宋神宗对佛教也是非常尊崇，想让相国寺发挥最大的作用，还让云门宗宗僧担任两院的住持，可见其相当看重佛教的传播、外来僧人与寺庙的建成。

宋徽宗由于崇信道教而对佛教相当不友善，其中他也听信一个名为林灵素的道士的谗言而做出了毁坏佛教的行为如下令在寺院置放孔子和老子像，还把道士的地位提高，贬低了佛教僧尼的地位等²⁷，可见佛教在当时是如此岌岌可危，只剩

²².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5。

²³. 林语涵，《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知识-佛教基本信仰与常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页 12。

²⁴.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 3。

²⁵.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 45，页 539。

²⁶.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页 3。

²⁷.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页 421。

禅宗与净土宗盛行，其余的佛教宗派开始没落。在宣和元年正月，宋徽宗发下诏令让佛教与道教合一，佛教可以免除被废弃的下场，但应以中国礼义为重中之重，不得不改革²⁸，称佛为大觉金仙，让佛穿上天尊的服装，称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穿上古代的“巾冠”。寺被称作宫、院被称作观²⁹。由此可见，宋徽宗非常尊崇道教而对佛教起到了相当大的约束与不好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尊重佛教。虽然之后灵素道士被严惩，佛教也逐渐恢复，但是不能否认徽宗所作的毁坏佛教的举动，庆幸的是徽宗的排佛时间段不长，道士林灵素的骗局被拆穿。宣和二年六月及九月，宋徽宗下旨恢复寺额和僧称³⁰。宋徽宗会做出对佛教不敬的举动也是因为其对佛教的义理不理解，也可见宋徽宗不如北宋其他皇帝对佛教的典籍那般理解，而造成其听信别人的谗言后就对佛教有所误解，处处贬低佛教。宋徽宗后来也醒悟自己被林灵素欺骗了，才下旨恢复佛教。

总而言之，北宋大多数的皇帝都劳心劳力地扶持佛教，虽也有像宋徽宗对佛教不敬的皇帝，但大致上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患与影响。佛教在太祖、太宗、真宗及仁宗时期的发展可谓如鱼得水，逐渐复兴繁盛，超越了唐朝及前几朝的佛教。

第二节 北宋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和排佛性

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摆脱以往唐、五代那般与禅僧交往的少数个别现象而转为与僧人们经常联系、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与社会风气。北宋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人士大夫如王安石、苏轼、苏辙、周敦颐和黄庭坚等人对北宋朝廷做出的贡

²⁸.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页421-422。

²⁹. [元]脱脱等，《宋史》卷22《徽宗纪四》，页403。

³⁰.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4。

献是为人所知的，而他们与佛教的渊源极深，他们陷入官场之争使他们对佛教禅法产生了兴趣并展开研究，从他们的著作也可见其中的端倪，也透露出他们各别的尊佛方式与思想。本文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信佛为例与孙复、石介、欧阳修般排佛为例来探讨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

王安石是宋神宗时期推行变法改革的重要的人员之一，王安石在文学方面的著作也是颇为人知的。王安石热衷于佛法，如其注释《楞严经》、《金刚经》、《维摩经》等及研读佛教经典，并与僧徒有所结交郊游³¹，如早年与黄龙派禅师瑞新、大觉怀璉等来往³²，可见王安石对佛教典籍相当熟悉，也与多位僧人结交来往，互相交流佛教的课题，并从中更快速学习及了解佛学。王安石晚年也“好观佛书”，也与佛印了元有所来往³³。由此可知，王安石晚年时也阅读佛教典籍，还结交僧人，可以说王安石晚年远离朝政，过着淡薄名利的生活。王安石也把自己的房子捐施出而成禅寺，自称为半山道人³⁴，可见晚年的王安石追随佛教，过着如僧侣般淡薄寡欲的生活。王安石曾与宋神宗讨论佛教的理论，如王安石认为佛教“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³⁵”，可见王安石对佛教的宽容豁达与不存在偏见，他能把佛教与儒家经典平等看待，并认为佛教与儒家学说是相通的，不能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而此二者都是对国家、社会及百姓有益的，虽然他们的道不同，但终究是善教。

³¹.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 2407。

³².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页 161。

³³.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14。

³⁴.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页 164。

³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7 册卷 233（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5659-5660。

苏轼的家族成员中有信佛的³⁶，其父母、妻子及弟苏辙都是信佛的。之后苏轼受其友王大年影响下而深研佛书，也被宋仁宗时期社会的礼佛敬僧的风尚习气影响³⁷，在经历“乌台诗案”贬官期间，苏轼在佛寺寄居，随僧吃斋，经历此次磨难让他更加深入学习佛教义理如“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³⁸，可见苏轼对儒释道三教涉略之深，官场的不顺使他对佛教的义理有所探求。苏轼在学佛教的时候较能理解佛教的“荡相遣执”、“遗世脱俗”的精神³⁹，与其所学的其他学说进行融会贯通，也从道家所提及的“相生相待”的学说引以为鉴，并以此联接佛教的相对主义，在思想与理解佛教的理论的同时，也突破他所学的佛教的理论⁴⁰，可见苏轼的佛学是集道家的学说融入佛学，苏轼所表现的不再是墨守成规的佛学，而是“创新”的佛学。苏轼时常和佛印的交流探讨禅⁴¹，由此可知苏轼对禅有了一定的理解，才能与佛印相交。苏轼对禅、律各宗派的理解与融合贯通的观念，如“禅律相攻。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事理皆融”，“遇物而应，施而无穷”⁴²等显示苏轼对佛教各宗派的见解。苏轼曾作《水陆法像赞》以赞赏水陆法会的普遍流行⁴³，可见苏轼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在佛教方面也有一番心得。苏轼对大乘经如《维摩》、《圆觉》、《金刚》有所研究，了解禅的自性清净、明心见性和华严宗的事理圆融，无碍自在的教义，在其诗里往往含有佛教因

³⁶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93。

³⁷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93。

³⁸ [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 1117。

³⁹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415。

⁴⁰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98。

⁴¹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23。

⁴² 苏轼，《祭龙井辩才文》，《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 2032。

⁴³ 苏轼，《水陆法像赞》，《苏轼全集》卷 22，页 1069。

素⁴⁴，可见苏轼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之深及其所遭遇的经历促使他追求佛教的义理，从而显示其对佛教的尊崇、向往并以此寻求慰藉。

黄庭坚出生的地方，洪州是临济宗演化出来的黄龙派盛行之地⁴⁵。黄庭坚早期与黄龙派的祖师慧南相交甚好⁴⁶。黄庭坚为母办理丧事期间，曾住在黄龙山寺，并与悟新、祖心和惟清禅师结交，祖心禅师曾教导他参禅，而悟新禅师则使他入悟⁴⁷，使他对佛教的禅宗有更深入的理解。黄庭坚对悟新和惟清十分欣赏，还把惟清推荐给其外甥，让他向惟清学习禅法⁴⁸，可见早期的黄庭坚身处在佛教氛围的环境中，经常接触佛教，并结交了多位禅僧，而佛教对他的影响可以从他的诗风及他所创作的佛教元素的作品中看出来。黄庭坚在学习佛教修行的见解也与其在儒家的修养理论的表达是相呼应的，如黄庭坚认为以佛学的修身养性能帮助参透儒家中的一些义理如《论语》，⁴⁹由此来说儒家与佛教的学说是有些关联的。黄庭坚对儒、释的研究也创造了其独门的佛教见解。此外，黄庭坚曾撰写《发愿文》⁵⁰，即“痛戒酒色与肉食，但朝粥午饭，如浮屠法”⁵¹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可见黄庭坚身处的环境影响其对佛教的理解程度，如他当时肯为了佛教戒荤、戒酒等，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加上他能坦然接受佛教的道理，并与儒家学说结合，实属难得。

北宋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如孙复、石介、欧阳修、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等排佛的，其中有些文人一直把佛看作是异端、是外来的宗教，排斥及打击佛

⁴⁴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2398。

⁴⁵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8。

⁴⁶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412。

⁴⁷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30。

⁴⁸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28。

⁴⁹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页 190。

⁵⁰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页 191。

⁵¹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27。

教⁵²，排佛的争议从没间断。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打击就是“奉夷狄之教的僧尼们恣意暖衣饱食而不工作”的观点，其中也有辽国、西夏等国的虎视眈眈，再加上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中的青苗法改革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骚乱，他们认为佛教影响了富国强兵的宗旨，甚至提出要禁绝佛教，还道出佛教的十个害处：

“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行正常之婚姻而紊乱风俗，多余的布施、斋会等皆耗殫财力，无限制地营缮寺观而夺去农耕的时间引诱人家子弟出家以致根绝孝养双亲之路，有的甚至使以家人陷入贫困之中”⁵³

佛教确实是认为布施的行为是非常神圣的，这与中国儒家提倡的自食其力有所冲突，但宋儒的批评未免有失偏颇，缺乏公允及包容心。此外，一些主张排佛的士大夫当中也与一些禅僧有所来往，甚至与禅僧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欧阳修虽对外来的佛教有排斥之心，但他也会与圆通居讷交好，也会欣赏及接纳信佛的苏氏兄弟⁵⁴，可见其虽然不信佛教，但不阻碍他与僧人和支持佛教的文人士大夫们来往。

如上文所述，可见宋朝士大夫的尊佛与学佛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有些士大夫是纯粹的学佛、有些文人把佛教与儒家学说合二为一、有些文人则把佛教和道教融汇贯通等。排佛的文人士大夫们出于对佛教提出的观念不赞同而产生了对佛教误解或偏差的想法是难以避免的，因当时北宋时期流传的宗教不只是佛教，也有

⁵²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03。

⁵³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05。

⁵⁴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页 43。

道教和儒家的学说，三教并立的局面，那些排佛的文人士大夫更偏向于其他宗教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做出诋毁或排佛的举动是不应该的。

第三章 北宋朝廷支持的政策下的佛教僧人与寺庙

从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的僧人于寺庙也可探讨佛教的兴盛的原因，其中僧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僧人不远千里传教与译经的举动也使北宋的佛教更广为人之，流传久远。寺庙的林立也是北宋皇帝的支持下得以建立及香火鼎盛。宋朝有僧官体制，分成两个机构即俗和僧。从俗官来看，北宋朝廷进行多方管制如鸿胪寺、中书和门下省、尚书祠部、开封府都各别负责佛教的事务，而僧官则设有左、右街僧录司，也是中央级僧署，提供多种职位如僧录、僧正、首座、副僧录等，而这些僧官负责处理僧团具体的事务，⁵⁵可见北宋朝廷对佛教的管理与掌控。

第一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僧人的境遇

北宋初期，道圆从天竺回来后带着使者、佛舍利和贝叶梵经觐见宋太祖，去西行取经的同时也能顺道扩大中国的国威。因此，中国僧人到印度取经是得到大宋皇帝的支持的⁵⁶。志磐在《佛祖统计》对此有所记载：

⁵⁵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7。

⁵⁶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2。

“伏闻支那国有大天子，至圣至神、富贵自在。自惭福薄，朝谒无由，遥礼皇恩，蒙赐金刚座释迦如来袈裟一领，即披著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寿命延长、一切有情，度诸沈溺。谨付沙门光远以释迦舍利进上⁵⁷”

北宋皇帝赠送袈裟给释迦如来的举动显示皇帝极其看重佛教，促进了中印宗教与文化交流。北宋时期出现多位僧人如太平兴国五年正月，三藏法天被召进京师，开始了译经的盛举，而二月时，北天竺伽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和乌填曩国三藏施护被召进行翻译佛教典籍的任务⁵⁸，可见佛经的翻译被视为非常重要与神圣的任务，北宋皇帝对僧人的召见也是印证了皇帝信佛及愿接纳佛教的传法与教理的缘由。

宋太宗曾赐天息灾为明教大师、法天为传教大师、施护为显教大师的称号，让这些大师各别翻译梵文的佛教经书，下诏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负责笔受缀文的任务，而被奉命为右街的僧录光禄卿杨说和兵部员外郎张洎负责润文而殿直刘素则负责监护⁵⁹，可见宋太宗对译经的看重，委任合适的人选进行译经。

宋太平兴国三年，赞宁进京后，宋太宗授予紫衣，并赐他“通慧大师”法号。在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还掌管了洛京宗教诸事，之后担任了汴京右街僧录，左街僧录，其著作包括了《高僧传·三集》、《内典集》、《三教圣贤事迹》、

⁵⁷.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3。

⁵⁸.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 398。

⁵⁹.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 398。

《外学集》、《僧史略》等书⁶⁰，可见宋太宗对赞宁等僧人的支持，当时佛教在儒家与道教的并驾齐驱的情况下要维持并发展下来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而让北宋佛教得以立足的最好方法是与皇帝及高官等有所来往。契嵩对佛，儒二教知之甚多，认为佛教和王道及儒家的纲常的理念是相同的，曾两次上书吁请宋仁宗对佛教的流传进行扶持⁶¹，以使佛教的流传更广泛化及顺利。众多僧人的到来对北宋的佛教传播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佛法的传播更广泛、众多佛教经书的翻译，更多百姓、文人等对佛教经书的理解也会加深，从而消解对佛教的偏见与误解。

北宋虽然对佛教给予支持的态度，但还是有所限制如正式剃度出家受戒必须有祠部给的度牒和空白戒牒，如若没有度牒与空白戒牒，则只能以童行或长发沙弥的身份暂居，等朝廷依据比例发放一定数量的度牒，并以合格的成绩通过考试才能正式剃度⁶²。出家者必须获得家长的同意，并且没有犯罪记录和“文身”的人才能出家，男的出家人称为行者，而女的出家者称为尼童，只有剃度了才能正式称为比丘和比丘尼⁶³，这显示北宋政府对剃度出家者所定的制度，以度牒和空白戒牒的方式来确认僧人的身份及控制僧人的人数等，还设置了考试，可见朝廷对僧人的管控及用心，以此表达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出家的。

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来看，宋真宗天禧五年，僧人的人数高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姑则达六万一千两百三十九人，是当时全国人口的二点三巴仙⁶⁴，可见僧人及尼姑的人数如此庞大。由此可见，僧人的增加使朝廷不得不管制以免发生“只想当僧尼，不想工作”或“犯人混进寺庙，冒充僧尼，逃避刑罚”的社

⁶⁰.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⁶¹. [宋]正受，《嘉泰普灯录》序一，页 4。

⁶².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2。

⁶³. 陈振，《宋史》，页 732。

⁶⁴.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113。

会风气。宋朝发生了大量度牒的贩卖，宋神宗时期，朝廷由此规定度牒的数量从一万到三万，师号的泛滥买卖⁶⁵也败坏社会风气，这也是朝廷须严管僧尼度牒产量的原因，避免被任何人随意滥用度牒。

第二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寺庙的建立与经济

北宋寺庙可分成禅寺、教寺和律寺，由各宗派的僧人形成⁶⁶。北宋寺庙的林立也是北宋朝廷的支持而成立并复兴，其中北宋众多皇帝、文人士大夫、百姓都对佛教相当尊崇。由于获得朝廷的支持，寺院里拥有数量庞大的田产⁶⁷，寺院也以此为生，可以说田产是寺院的经济来源之一。宋朝寺院经济规模的庞大也包括了出租空房、商店、长生库、碾碓等的营生让寺院的收入相当充足，而这些有营生的僧人也如地主般与普通百姓有了商业上的竞争，而这也引发了一些朝中大臣排佛的争议⁶⁸，引起他们对佛教不满和误解。寺院也参与了公益和救济活动如赈济饥民等⁶⁹，大大帮助了北宋百姓和社会的发展，使百姓获得心灵上的慰藉。通过寺院的公益活动，百姓也得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由于多方的支持，寺院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变得普及化。上至高官权贵，下至黎民百姓都有信奉佛教者⁷⁰，可见宋代佛教的普及化，这是因为佛教所提出的观

⁶⁵.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15。

⁶⁶.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4。

⁶⁷.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7。

⁶⁸.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7。

⁶⁹.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1151-1152。

⁷⁰.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2197。

念与理论是能被北宋多数人所接受的，也没有阶级之分。寺庙的林立与发展也是有赖于当时佛教信众如皇帝、士大夫、文人、皇亲贵胄、商人、百姓的供奉的香油及香火钱等，与大众的信仰需求相呼应⁷¹，进而使寺庙的经济得以延续，寺庙的数量也与日俱增。苏辙《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提及“四方清净居，多被僧所占。既无世俗营，百事得丰赡”⁷²，可见北宋时期佛教寺庙的真实写照，虽然没有世俗的营利，寺庙经济也充足，显示朝廷对寺庙的支持，同时也透露出僧人的庞大数量。

宋太宗曾经下令在开宝寺建三百六十尺高，十一层的舍利塔，耗时八年建成。舍利塔建成的那天，宋太宗亲自放上舍利⁷³，可见宋太宗对佛教舍利级其塔的重视，耗费巨大资金及时间建造舍利塔。北宋时期约有四万余所寺院，僧人尼姑的人数也高达四十三万⁷⁴，可见其数量之庞大，这也是北宋政府的支持与允准下才能使寺院的数量如此之多，也能经营得很好，没有面临经济困难。

北宋朝廷对佛教的支持少不了寺庙的建立，其中宋仁宗、宋英宗的家属及皇亲贵胄和宋神宗为佛寺的建立可算是出一份力的。宋仁宗曾于京城建立禅宗寺院，从宋仁宗对禅宗的了解及扶持来看，宋仁宗于京城建立禅宗寺院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显示宋仁宗非常看重禅宗的发展。法云禅寺的建成也是有赖于宋英宗之三女、神宗之妹历封冀国、秦国、越国大长公主与驸马都尉张敦礼于元丰五年请求建成法云禅寺⁷⁵。宋英宗和宋神宗及其家属要求建立佛寺的举动无疑透露了当

⁷¹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2200。

⁷² [宋] 苏辙，《栞城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 88。

⁷³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页 456。

⁷⁴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页 456。

⁷⁵ [宋] 正受，《嘉泰普灯录》序一，页 3。

时的佛教在皇亲贵胄之间的盛行，以致于让他们也想建立佛寺。宋神宗元丰三年时，神宗下令把江州东林律院改成禅宗寺院，还让临济派黄龙系僧人常总担任住持⁷⁶，可见禅宗的教义被朝廷认可，禅宗在北宋的发展是比其他宗派来得好的。这也意味着佛教从外来的观念转变而成中国佛教了，也可看出佛教慢慢被大众接受而深入人心的过程，其中也有与儒家教义或道家理论结合的趋势。

第四章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各宗派的发展及译经

佛教在宋代可列为三教，即禅、教、律，也被称作三宗⁷⁷。禅是禅宗，是最盛行的，可分成云门、临济和曹洞三宗。教则是禅宗外的诸宗，如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律是律宗⁷⁸。中国禅宗来源于达摩祖师，之后发展成中国禅，其中也显示了中印文化的交融下产生的禅⁷⁹。禅宗相较其他宗派来说更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实践品格⁸⁰。经过代代相传，禅宗逐渐兴盛而演变成五宗七宗，即五家七宗。云门宗便由此产生。宋初时期，云门宗相当兴盛，这种风气已传至大江南北，横跨中原各地⁸¹。本文以北宋佛教各宗派如禅宗的云门宗、临济宗及曹洞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为例探讨北宋时期佛教各宗派的发展与流传。

⁷⁶.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页 550。

⁷⁷.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4。

⁷⁸.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4。

⁷⁹. 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 1。

⁸⁰.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1956。

⁸¹.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三，页 1。

第一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宗派的发展

北宋时期佛教的复兴使当时的佛教宗派也进入了兴盛的阶段，这其中也包括了宋朝的重文轻武现象的渲染，而北宋人们较注重文史的发展下，文字禅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出现了不少多样化体裁、浩大繁多的卷帙的文字著述如传法语录、拈古、颂古、评唱等⁸²，这对北宋佛教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文字禅为北宋划上了与其他朝代的佛教不同而特别的色彩。

禅宗中有五宗，其中最盛行的宗派是云门宗，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是临济宗和曹洞宗。⁸³禅宗专门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宗派的原则，更倾向于师承即了解先师的言行，这也是“禅祖之语要，不以华藻为事，需为常谈直说，侍者小师随之笔录，名为语录⁸⁴”。文偃禅师是禅宗之云门宗的创始人，创立于五代十国。文偃禅师之弟子大约八十八人，其中有些弟子活跃于宋初年间太祖与太宗时期的传法⁸⁵。云门宗从岭南地区到湖南、江西、浙江扩大发展⁸⁶，云门宗僧雪窦重显曾以偈颂的方式来赞颂前人所作的公案，并撰写《雪窦颂古》百则流传至今⁸⁷。北宋云门宗在宋仁宗至宋徽宗初期发展迅速，云门禅僧在寺院传法或担任皇家寺院的住持，并与士大夫来往甚密，时常探讨一些天道、性命等的

⁸².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二，页4。

⁸³.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2。

⁸⁴.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421。

⁸⁵.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页3。

⁸⁶.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四册，页2313。

⁸⁷.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二，页4。

问题，扩大民间佛教的影响⁸⁸，可见云门宗人才辈出，加上朝廷的扶持使其能迅速流传与发展。

临济宗最早成立，与北宋的云门宗有着相同发展的盛势、流传久远。据说临济宗创始人为义玄，于镇州临济院聚集徒弟传授佛法。临济宗的能长久地传播主要是出现弟子兴化存奖法系。临济宗于宋真宗和宋仁宗初期较为活跃，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盛，加上中央朝廷和各州县政府给予的支持使临济宗得以推行。临济宗的多数传法在北方，以期得到振兴，但到了他的弟子时，很多禅师传法于南方地区，扩大了临济宗传法的范围⁸⁹，也便于临济宗的复兴。善昭师从省念，传法时特别注重语言文字的表达，还时常引用过往禅师的语录，之后撰写了《颂古百则》影响了宋代的文字禅的发展⁹⁰，可见其在传教时的严谨和责任。临济宗之后分成杨岐派和黄龙派⁹¹。黄龙派在北宋江南地区促进传播佛教的进度，他们经常与文人士大夫交往，互相结交并探讨佛法，从而获得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支持。杨岐派复兴时已经是北宋末期，而黄龙派迈向衰微的地步。北宋末临济宗的传承由杨岐派接手⁹²，替代黄龙派发展。

北宋曹洞宗在宋初时较衰微，随州大洪山作为曹洞宗的基地⁹³，虽本寂法系四传后断绝，但靠云居道膺一脉才延续下来。到了警玄时期，曹洞宗也出现衰落的现象，甚至们没有合适的法嗣，托临济宗法远的协助下才让其弟子义青传承警玄的曹洞宗。之后义青弟子大洪报恩和芙蓉道楷在禅法得到发展⁹⁴，可见临济宗与曹

⁸⁸.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二，页3。

⁸⁹.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8。

⁹⁰.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8。

⁹¹.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8。

⁹².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9。

⁹³.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9。

⁹⁴.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9。

洞宗的势力相差甚大，曹洞宗从一开始谨小慎微到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地步，已实属不易。

北宋的天台宗是较为流行的一派，盛行于江浙地区。北宋天台宗著名僧人是知礼，其被誉为天台宗的中兴者，宋真宗对知礼是相当欣赏的⁹⁵。宋仁宗时期，天台宗的典籍也被列入大藏经中⁹⁶，可见宋仁宗认可天台宗的典籍。北宋天台宗面临“山家”与“山外”的争论。此争始于晤恩《金光明玄义发挥记》而《金光明经玄义》广本的真伪成为争论的话题。知礼是山家派，支持传统天台宗教义，认为《金光明经玄义》的广本是真的，反驳了山外派的认为《金光明经玄义》广本是伪的观念，认为晤恩一派有教而无观，有违天台宗的并重的观点⁹⁷及对山外派接纳华严宗的教义颇为不满，而山家派的势力相较晤恩一派来说较大，这场争论是山家派占上风。晤恩一脉的孤山智圆等人则属山外派，山外派不久也没落了⁹⁸，可见知礼一派影响力之深，势力之大，也与其强调的观心法门更与士大夫及社会的想法更加贴近，也使天台宗的流传的范围更加广阔。

此外，律宗在北宋时期相当盛行在江浙地区，而元照和允堪是其中的著名的名僧，与天台宗的渊源颇深。⁹⁹各宗派的佛教传播情况存在着不同的状况与发展。律宗的僧人被称为律师。宋仁宗在位时，律宗僧人建戒台度僧，其中地区包括了苏州开元寺、杭州大昭庆寺和秀州精严寺，这让律宗得以复兴¹⁰⁰，可见宋仁宗对佛教律宗的支持才使律宗渐渐为人所知，朝廷对佛教的允准起到一定的作用。律宗

⁹⁵.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页 55。

⁹⁶.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

⁹⁷.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68。

⁹⁸.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页 55。

⁹⁹.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

¹⁰⁰. 陈振，《宋史》，页 727。

也被称为“会正宗”，这是源自于律宗的著作《会正记》，而律宗的僧人赞宁也奉诏撰写《大宋高僧传》，延续唐代的《续高僧传》¹⁰¹，可见律宗在北宋的发展还是很好且备受朝廷支持的，加上律宗人才辈出如赞宁、元照等的出现也使律宗得以兴盛发展。

北宋时期的华严宗的流传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后有些没落，而当时华严宗的子璿和晋水净源力图重新扶持华严宗。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曾让子璿修法华忏，为国祈福¹⁰²，当时没落的华严宗能被宋真宗注意，并委派子璿来修法华忏，可见当时子璿的名声远扬甚至连宋真宗都知晓他，而让他修法华忏的举动也意味着宋真宗相信他的造诣和能力。在宋神宗时期，杭州慧音禅院的净源推广华严宗。在元佑元年时，师从净源的原高丽皇子把流失已久的经疏带回北宋，慧音禅院易名为教院，由此成了华严宗的传播之地，净源也被称为华严宗的中兴教主¹⁰³，可见华严宗在北宋神宗时期开始被推广及流传，而首当其功的是净源，因华严宗在唐末时已迈向衰微的地步，宋神宗时期净源的传播又使华严宗得以延续，并能流传至高丽地区，实属不易。

净土宗在北宋是各宗派僧人承认的信仰，包括多位知名的云门宗禅僧。他们当中也有主张禅净双修的，还有净土宗与天台宗的台净融合。净土宗在北宋是普遍流行的，已经流入民间¹⁰⁴，可见净土宗的有效的传播，受百姓欢迎。北宋太宗时期时，杭州昭庆寺的僧人省常结“莲社”于杭州西湖边，结“莲社”的活动之后易名为“易行社”，这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僧众及信徒前来并入社，开启了结社传

¹⁰¹. 陈振，《宋史》，页 727。

¹⁰².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69。

¹⁰³. 陈振，《宋史》，页 727-728。

¹⁰⁴.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台北：正闻出版社，1989），页 258。

教之风¹⁰⁵。净行社集结一百二十三人专修净业，刻阿弥陀佛像，刺身血写华严净行品¹⁰⁶，可见净土宗的传教方式与其他佛教宗派传教方式稍微有些不同，且具有特色，开创了以结社的方式来传教的风气，具备新意，是为净土宗带来更好发展的方式。宋真宗时期的净土宗有办起念佛施戒会而仁宗时期,在京师成立的净土会召集十万的僧人和群众一起唱佛号¹⁰⁷，可以想象当时的浩大场面。当时还有白莲社、净土道场等。宋神宗和哲宗时期有净业社、湖州八圣寺的万人结社、莲花胜会。徽宗时也有钱塘净土会、兴净业社。¹⁰⁸这显示净土宗在北宋时期的活跃程度，即净土宗在北宋的每个不同时期都有类似结社的活动。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佛教的各个宗派如禅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有其不同的特色，即拥有不同的复兴时期、传法区域、经书、宗义、但最终还是引导人们向善、宣扬佛法的宗教。朝廷对佛教宗派的支持也使这些宗派得以快速流传，发展得更加顺利。

第二节 北宋时期朝廷支持下的佛教译经

译经对中国佛教的传播来说是极其重要，不容忽视的，佛教的译经也是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的，北宋佛教的译经延续了唐朝翻译佛经的盛举。上文有提及北宋皇帝支持译经的举动，其中宋太宗时期的译经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译经院在都城的建立也使当时成为了新的佛教中心，也奠定了禅宗的发展。

¹⁰⁵. 陈振，《宋史》，页 727。

¹⁰⁶.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页 264。

¹⁰⁷.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页 264。

¹⁰⁸. 闫孟祥，《宋代佛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 651-652。

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对译经过程的描述如下：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¹⁰⁹。

译经院以中堂为译经处，东序为润文处，西序为证义处¹¹⁰。这三堂的设立使经文的翻译更加的严谨和完善即主译为专才们讲解经史并与这些专才们讨论、翻译之后把讲解与讨论的记录送放到东序的润文，而东序润文把这记录翻译成汉字的初稿，并送到西序的证义以审查这些译文是否能表达原意，如若发现译文与原文有出入的地方，修改后则遣送回东序，东序依据西序的修改而作文字的润色，这是证义所作的修改是基于原文义理，用字方面欠缺典雅。润色后的文章又传给西序审查是否有违原意，这过程持续至双方对译文满意才停止，可见北宋时期的佛教经文的翻译相当复杂与耗时，其中严谨的佛教仪式感与对佛教经典的尊敬也显现出来，

¹⁰⁹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¹¹⁰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从上文的描述也可见译经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也促进了东西佛教的交流与传播。经文翻译的成功也是以靠这些对佛教典籍相当熟悉与了解的大师与人才们才能做到。梵文的翻译绝对是艰巨的任务，这也是继承前朝的佛经翻译工作，也开启了中国佛教的重要历程。

这些译经的过程是天息灾建议的，《佛祖统纪》中对译经的过程记载如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违旋，所请冥佑，以殄魔障”¹¹¹。

从上文的描述可见译经是非常神圣及仪式感的，并不是直接且快速地译经，而是需有所准备，代表了僧侣们对译经的看重与对佛教的虔诚。译经的成就也是取决于朝廷的支持，僧侣们才能获得机会以如此严谨的过程与完善的部门分配与执行译经的任务，使翻译的经文更加的准确。

虽然宋朝佛经的翻译只是唐代的四分之一¹¹²，但它却塑造了宋代佛教及社会文化，对当时与后来的佛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从它对佛教史的影响来说其实并不大。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是派遣高官主持译经的举动。北宋在译经中设置了润文官的制度，初期只是派遣朝廷官员担任此润文官，而到了真宗晚年才以“宰辅

¹¹¹.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¹¹².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3。

“身份的高官来担任译经和润文的职位¹¹³”，这样表示对译经的看重和尊崇。宋仁宗时期的译经最辉煌，大小乘佛典达两百四十三部五百七十四卷。宋神宗于熙宁四年废止译经院，罢黜译经史、润文官的职位，译经事业也由此告一段落¹¹⁴。宋徽宗时期仍然有少数的译出来的佛典¹¹⁵。译经终止于夏竦奉命撰写《传法院碑铭》的六年后，由于缺乏译主而遭到废止下场¹¹⁶，译主在北宋时期的佛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佛经的翻译都是他们操办的，而缺少译主的后果就是译经的过程的终止，可见译经的过程极其繁琐与严谨，也开创了大宋佛教的译经的盛举。

第五章 结论

北宋时期佛教兴盛的流传可从朝廷中多位皇帝与文人士大夫的支持、朝廷支持下的僧人传教与寺庙的建立、佛教各宗派发展和译经的过程中看出。宋太宗时期的译经是最兴盛的，其中不乏外来僧的传佛教的善举与毅力、朝廷的支持等的重要因素才使佛教译经的过程得以顺利进展。译经的过程也是得到朝廷的支持才能请外僧来北宋太平兴国寺译经，并以众多僧人及部门的分配布局来用较为准确的词句来书写及翻译经书，这也保证了经书的准确性与让北宋皇帝、文人士大夫和人民更加明白经书的内容，可以说是为中国历史、宗教及文化上添上了佛教色彩，实属珍贵及难得。

¹¹³.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3。

¹¹⁴.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458。

¹¹⁵.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3。

¹¹⁶.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410。

北宋时期的寺庙数量高达四万。这也是由于北宋朝廷的支持及众多信仰佛教者的需求下而产生的。从众多皇帝对佛教典籍熟悉程度及对佛教僧人的了解来看，北宋多位皇帝都有研读佛教经书，加上皇帝与僧人的频繁来往让他们可以进行交流，加深对佛教的认识。这种情况也是发生在文人士大夫身上，他们也与僧人交往甚密，彼此探讨佛教，这也无疑形成了北宋时期独特的佛教社会风气，从而影响民间百姓信佛的风气。

北宋佛教的传播也是有赖于前人一代一代地保留与流传，使中国佛教独具特色。北宋佛教的流传值得更多学者去研究，其中包含了弥足珍贵的北宋佛教的发展过程及历史，是极具意义的。通过我所用的理论分析法、比较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等，我才更有效地搜集关于北宋时期佛教的流传的资料，筛选适合放在本文的内容，并核实内容的真实性，以助我完成此论文。从中，我也发现到研究北宋佛教的学者较少，有关北宋佛教寺庙的书籍也是少之又少，一些研究方面的成果还不够完善，北宋历史学家或僧人所记载的北宋佛教发展史的内容是比较少且杂的，也不够详细，这为我寻找论文相关资料上增加了些许难度。

北宋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等的发展也是相当好的，尤其禅宗受到很多皇帝的大力扶持，也是北宋最兴盛的佛教宗派。北宋多位皇帝对佛教的支持无形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让更多僧人得以来到中国进行佛教的宣传等活动。北宋政府还设置了剃度及度牒制度，让僧尼参加经文考试等的措施也是防止更多人冒充僧尼及逃避刑罚等。虽然其中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不满佛教，认为佛教是外来的，而不是中国自身的宗教等观念而引发排佛的争议，及做出排佛的举动，但他们还是没法阻止佛教的发展，所幸佛教得到皇帝及许多文人士大夫和百姓的支持，才不至于像五代时期那般没落，发展得兴盛。

引用书目

书籍

1.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林语涵,《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知识-佛教基本信仰与常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6. 牟宗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7.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8.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 [宋]苏轼,《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 [宋]苏辙,《栞城后集》,《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 [宋]苏辙，《栞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3.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宗教理史》，台北：正闻出版社，1989。
16.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7. 闫孟祥，《宋代佛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8.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19. 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0.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1.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22.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台北：天华出版，2005。
23. [宋]志磐，《佛祖统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4.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